

## 关于比较美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陈 伟 王 捷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sup>①</sup>这里的文学一词泛指一切文化的产品。按马克思、恩格斯的看法，随着资本主义开拓了商品的世界市场，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产品也具有了世界性。其实，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以及这种流通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早在资产阶级、甚至封建阶级形成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只是它还没有像近代资产阶级那样，把一切生产和消费都纳入大写的“世界市场”。

与商品流通相一致，世界各区域文化的流通也伴随着世界文明的发展而不绝如缕。它们对促进整个世界的文化事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全球精神产品的创造和建设。

整个世界文化是一个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子系统产品的互相影响是顺理成章和不可避免的。在人类历史上，正是由于各种区域文化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取长补短，才造就了当今社会五光十色、绚丽多彩的精神文明，因此，站在历史的门槛上，比较、对照各种区域文化系统的特点，研究它们相互之间曾经产生过的影响，对于建设未来的文化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在美学领域进行比较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和目的。

### 二

作为一门学科，美学在 19 世纪才创立。创为一种意识或文化，美学却肇始于人类精神文明的滥觞之时。早在成千上万年，人类文明的几个发祥地就不约而同地衍生了最原始的、相似的文化之光。如在古埃及，早期王国之前就产生了图形文字，像“水”字被画成三条波形的横纹，“山”字被画成夹峙河谷的两座山峰。在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最早的文字也是图形符号，以一种符号表达一种意思。古希腊早期米诺斯文化中的文字，同样是图画文字和象形文字。古印度的文字，据人类学家考证，至公元前 2500~前 1500 年之间的哈帕拉文化时期才由图画文字演进到带有表音性质的文字。而中国的象形文字一直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文字。人类早期文明的发祥地，除了产生的文字具有相似性外，人们崇拜的宗教也具有相似性。

\* 此文系由陈伟、王捷合著的《东方美学对西方的影响》的导言，该书即将由学林出版社出版。

如古埃及的宗教源于氏族图腾崇拜,各州都有自己的动物图腾对象,像斐斯州崇拜公牛,提尼斯州崇拜老鹰,此外还崇拜教人稼穡的奥西里斯神,给人以光明的太阳神等。两河流域的先民也有自己的太阳神沙玛什,有发明锄头教人耕种的神祇恩利尔等。东方黄河流域的先民则把动物图腾看作民族的标记,像黄帝的部落侍奉“龙”,炎帝的部落侍奉“凤”。华夏先民的农业神为“神农”。世上的先民应用的文字相似,信奉的神祇相似,这可归因于,各地先民的生产条件极为相似,生产方式几乎雷同,所以他们产生的最初的文化具有一致性,那么,毫无疑问,世界各地的文化必然是相同的。但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区域的人们基于不同的自然条件必定会采用不同的生产方式,然后也相应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社会愈发展,世界各地产生的文字、宗教及审美观念等文化也便愈具有地域特色。这种区域文化显然是各有所长的,因此,对各种高度发达的区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便能更积极地推动世界整体文化的进步。

审美意识显示着人类文明的水平,是人类社会实践的先导。马克思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sup>②</sup>那就是说,人在实践中总是以这样一种尺度来塑造事物: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最大程度地把握外在客体世界,同时最大程度地伸张主体世界的自由性。这样塑造出来的事物便是美的事物。然而,在具体的文明发展史上,由此产生了种种差异。首先,美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它是发展着的。在某一区域或民族中被认为是美的东西、被认为是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出来的东西,在其它区域或民族中,并不一定被认为是美的,并不一定被认为符合美的规律。因为这个区域或民族的人们对外在客体的把握和内在主体自由性的伸展不一定相同于那个区域或民族的人们对外在客体的把握和内在主体自由性的伸展。换句话说,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不同区域或民族的人们对美的观念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例如,非洲有个原始部落的妇女,在自己的上嘴唇上钻一个孔,孔里穿上一个叫呶来来的金属或竹的大环子。有人问这个部落的首领,妇女为什么戴这样的环子。他回答,是为了美。<sup>③</sup>这样的美学观念与发达文明社会的美学观念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在发达文明社会看来不可思议的美学观念也许在那儿是十分合理的。对于这类美学观念的差异是很难简单地以“优秀”、“低劣”来打上标签的。事实上,即使在发达文明社会,也存在着由于经济发展不同步而产生的美学思想的差异,并且,经济发展迅捷的社会不一定在美学思想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像18世纪的英国和德国就是这样的例子。英国经过产业革命,经济发达,美学思想却因袭老调,十分枯燥。德国经济落后,文化科学却十分活跃,产生了康德、黑格尔、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有世界影响的美学思想家。这种种现象只有在文化流通的背景下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明了。

其次,既然美是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最大程度地把握客体世界和伸展主体自由性,那么,根据具体环境的不同,以不同的方式方法达致这个目标便具有同样的合理性。正因为这样,在世界不同区域和民族中产生的千姿百态的美才不仅吸引着本区域、本民族的人们,使他们引以为自豪,而且也吸引着其他区域和民族的人们,使他们感慨赞叹,流连忘返。如每年数以万计的各国观众参观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便是明证。立足本地区、本民族的美,汲取它地区、它民族的美,是美学观念发展的健康之路,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健康之路。在各相同或相近的发达文明社会,各种文明各有特点,没有优劣之分,所谓“占优势的文化”只不过更好地借鉴、吸收了其它文化的长处而已。美学思想也不例外。但是,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在发展史上都有自己的旺盛期,也有自己的缓慢期,例如,西方史学家认为,公元4世纪至13世纪是“黑暗的中世纪”,因为在这段时期中,由于教会的统治,西方各种文化乃至美学思想几乎停滞不前,毫无发展。可是这一千年间,在中国正是南北朝和唐、宋盛世,各种文化昌盛发达,并通过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使日本、高丽、安南等都分享了这种文化的繁荣。因此,把中

世纪统称为“黑暗的”是不确切的。到近代,欧洲由于“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达,科技居于领先地位,同时带动了文化的前进。相对而言,大多数东方国家处于发展中状态。西方有些学者据此认为:“从伯利克里和凯撒的时代直到现在,历史的伟大戏剧中的主角,都是由欧洲的白种人担任的。”<sup>④</sup>这种见解同样是错误的。且不说这种见解与承认欧洲有过“黑暗的中世纪自相矛盾,与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也是不符合的。从有史社会以来,西亚、中亚、东亚乃至非洲的人们,都对欧洲的文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如伊斯兰文化通过西班牙影响欧洲,中国文化经由“丝绸之路”和通过日本与荷兰的贸易影响欧洲等。事实上,社会的前进都是在各种经济、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完成的,彼消此长,扬长补短。所以,要真正认识某种文化现象——如美学观念——的发展,只有在文化流通的背景下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明了。

中国梁朝的文论家刘勰谈文学评论时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sup>⑤</sup>从微观上看,探索一篇文章的内涵,需要披文入情,沿波讨源。从宏观上看,探索一个社会某一时期的美学观念,也需要由表及里、沿波讨源。美学是在文化流通中成长和发展的,要探索美学思想生成、转换的本质和规律,同样需要采用由表及里、沿波讨源的方法,充分认识文化流通的特点,比较分析各种美学观念生成转化的背景和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使交织在社会历史各种作用力之下的美学思想“虽幽必显”,呈现出本来的面目。这是比较美学作为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和重要意义。

### 三

比较美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美学研究,并且研究美学与其它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刻、音乐等)、哲学、历史、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比较美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学科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或现象采纳收集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这些事实或现象加以阐释,扩大认识的视野,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对各个不同文化背景和地理环境的国家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美学现象的异点或同点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使我们发现一种影响、一种假设、一种纽带,使我们可以局部地具体地用一种美学风貌、形态、风格甚至趣味,作为另一种美学风貌、形态、风格以及趣味必然的出发点,从而找到不同美学现象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和事实联系。

目前,比较文学的研究基本有两种方法,一种重在揭示某一区域或国家的文学流派、倾向、思潮对其它区域或国家的影响,一种重在分析不同区域或国家的文学流派、倾向、思潮之间产生相似性的基础。前者被称为“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后者被称为“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比较美学的研究大致亦可分为“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两种。然而,在比较研究中,无论是“平行研究”还是“影响研究”,它们都既有长处,又有短处。

先言“平行研究”。人类在相似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不同民族会有相近的发展水平,类似的思想情感和心理特征,使不少民族的文化现象和审美风貌在毫无联系的情况下,也会呈出惊人的雷同现象。平行研究实际上是将没有任何联系的民族、国家的美学现象作平行对照,对相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或国家的两种美学现象进行分析、比较,找出其中的相同点或同点。如将处于相近历史阶段的东西方哲人孔子与柏拉图的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优秀剧作家莎士比亚的戏剧与中国明代优秀剧作家汤显祖的戏曲进行比较研究,皆属此类。反过来平行的比较研究也可以不受历史时期的局限,把不同区域或国家的相似的美学现象进行分析比较,探寻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之异同。如将中国南北朝时期“镂金错彩”的美学风格与法国纤细虚饰的“洛可可”美学风格进行比较研究,将曹雪芹《红楼梦》中的“无事忙”贾宝

玉与普希金笔下“多余的人”叶普盖尼·欧涅金进行比较,均属此类。此外还有其它种类的平行比较研究,简直举不胜举。

平行的比较研究方法有很多优点,第一,它可以不受研究对象具体背景的局限,突破了影响研究的保守和狭隘,扩展了比较美学的研究领域。它可以任意提取出被研究的方面,仅通过比较和对照本身把它们联系起来而不必具有任何先决条件。第二,平行的比较研究方法重在比较本身,因此,被提取出进行比较的方面往往特征明显,脉络清晰,并且通过双方的平行比较和对照,使自身的特性愈加突出地显示出来。第三,平行的比较研究在方法上注重审美批评、意蕴发掘和理论构建,重视审美价值和人文品位的判断,而不是着眼于历史批评、事实考据和材料搜集,具有广泛的文化意义。

自然,平行的比较研究也有不足之处。由于平行研究的研究范围过于宽泛,内容庞杂,容易将比较美学的“美学性”淹没,变成社会史、思想史或文化史之类的研究,不利于比较美学成为一门严密的、有美学研究特性的学科。同时,把某些表面相似的美学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也往往会导致牵强附会的结论。

再言“影响研究”。“影响研究”崇尚实证,重视资料挖掘和考据,界定清晰,方法严谨。它往往关注某一区域或国家的美学现象对其它区域或国家的影响。然后提取“原本”和“摹本”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揭示出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异同之处和彼此扬弃。影响的比较研究可以从“原本”的角度双向分析研究的对象,如分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对日本及西方国家的影响,揭示近代西方美学观念对中国审美趣味的影响,皆属此类。影响的比较研究也从“摹本”的角度分析研究对象,如揭示中国唐宋佛教美学思想对印度经典佛教美学思想的扬弃,分析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结合国情选择接受外国的美学新观念,均属此类。作为一个泱泱古国,中国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影响、接受和扬弃其它文化的事例不胜枚举,它们都可被纳入影响的比较研究的范围。

影响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有很多优点,第一,这种比较研究的对象,相互之间的关系直接明了,渊源十分清晰,可以避免平行研究中的牵强附会。第二,影响的比较研究方法重在研究对象,“原本”与“摹本”的对照既可以看出“原本”对“摹本”的影响所及,又可以揭示“摹本”对“原本”的选择接受、发展改造。第三,影响的比较重视研究对象的社会历史背景。一个区域或国家的美学现象对其它区域或国家的美学产生影响,既有“原本”文化社会历史基础的原因,也有“摹本”文化社会历史基础的原因。通过对“原本”和“摹本”之间影响的比较,不仅能认识它们之间影响的事实,而且能够认识产生这种影响的社会历史原因。这样,对了解某种美学现象的性质、背景及发展趋向将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由此得出对某种美学现象的界定也更科学、更符合实际。

但毋庸讳言,影响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一个区域或国家的文化对其它区域或国家的影响,有些比较直接明了,有些却很曲折,前者如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西方一些新的哲学、科学思想对中国美学思想、文学创作的影响;这种影响较显著。后者如中国传统文化在古代长期对日本有影响,而随着日本近代与欧洲的通商贸易,中国古典的美学趣味间接地对欧洲文化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就比较曲折。从理论上说,这种两级跳式的影响还算清晰可辨,但实际却复杂得多。因为,首先,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就有“扬弃”的过程,成形的日本文化既有中国的渊源,更多却体现着自己的特点。其次,欧洲对日本化的中国文化的接受又有一个“扬弃”的过程,最终造就的欧洲的“中国风格”作品里既有中国的“母本”,又有日本的因素,再加上“欧化”的取舍消长,结果,“影响关系”的两端必然大相异趣。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影响的

比较研究必然困难不少。第二,一种文化对其它文化产生影响,或者一种文化接受其它文化的影响,在有些历史阶段比较明显,产生的成果较多,史料证据也较充分。而在有些历史阶段则比较隐晦,产生的成果较少,史料证据也较缺乏。在后一种情况下,对两种美学现象作影响的比较研究,局限性便不少;不能像“平行比较”那样可收集到任何情况下的美学现象的论据材料。所以说,影响的比较研究一方面能使研究的对象关系明了、背景清楚,功过昭然;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跳舞”时“镣铐”的碍手碍脚亦是必然的。

两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各有长处和短处,不能简单地作左右袒,就像佛教里讲求顿悟的禅宗和主张苦修的律宗都能达成正果一样。但本书所从事的比较美学研究主要侧重于影响的比较一类,但也不乏在一些具体层面上作适当的平行比照研究。期望凭藉殷实的史料、充分的论据以及具体的史实,揭示出古代中国和以其为代表的东方美学思想,严格地说是一种东方美学精神,美学时尚,美学情趣,美学风格是怎样进入西方,并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的,从而展现这个世界文明古国对人类的进步事业和文化创造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 四

美学的比较研究是在文化的交流和沟通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美学的影响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影响,而两种文化之间产生相互影响又往往通过一定的途径。回顾人类历史,造成文化交往的途径大致有四种,即战争、通商、留学和传教。

美国名将乔治·巴顿曾说过:“战争是人类文明的最高体现。”这话总体上不正确,但又有合理成份。说它不正确在于,它将人类争斗的最高形式和毁灭人类文明的最激烈手段——战争和它的对立面——文明相提并论;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之嫌。说它有合理成分在于,在阶级社会中,人类文明的进步常常伴随着残酷的阶级斗争,而战争作为阶级斗争的重要形式,在许多历史阶段,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前进,避免了人类文明的倒退。这种战争的血腥里闪烁着文明之光,如中国古代封建制的周朝消灭奴隶制的商朝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纳粹法西斯倒行逆施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战争。战争包含着血腥、杀戮和毁灭,战争也包含着抢劫、掠夺和强占。血腥、杀戮和毁灭是用一种文明消灭另一种文明,以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抢劫、掠夺和强占都是用一种文明去强行拥有另一种文明,将一种文化强行纳入另一种文化。通过战争手段,一种文明或文化无论被强行纳入另一种文明或文化,还是强迫接受另一种文明或文化,都是十分痛苦和耻辱的事。然后从客观后果看,它对两种文明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例如,西欧教会从11世纪末开始发动的数次对东方国家的侵略、掠夺战争——十字军东征。这些侵略战争的目的在于,西欧教会为了扩大权势、掠夺东方国家的财富,西欧封建主为了扩大领地、寻找新的可支持其挥霍生活的财源,而西欧农民则为了摆脱从1089年至1095年连续七年农业歉收造成的贫困饥馑和沉重债务。因此,侵略者的目光全盯着东方的财富,他们打的是一场以抢劫为目的的不义战争。十字军东侵的社会、政治后果姑且不论,它对意大利北部和西部靠地中海的城市扩大与东方的贸易确实起了促进的作用。历史学家指出:“十字军运动结束时,由东方运往西欧的商品,比以前增加约十倍。当时的东方在经济和生产技术上都比西方先进。从东方回去的十字军骑士,开始服用轻软美好的东方织品,食用精美的、加有香料的菜肴,饮用芳香的东方美酒。随着贸易增加,东方的产品和先进技术如金属加工、纺织、制糖等也更多地传到西方。”<sup>①</sup>可以说,历时近两个世纪的十字军东侵极大地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文化交流、融汇,使东方文明和文化——包括审美趣味、文艺风格——对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和影响。

如果说,战争是以恶的手段促进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的话,那么,通商便是以善的手段积极促进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在每一个区域或国家,文明之光最耀眼的地方必然是通商贸易最发达的地方。这些地方不仅汇集着本区域或国家的文明和文化,而且最大程度吸收着通过商贸而泊来的其它文明和文化,由此造就出最辉煌的文明和文化的型式。例如,14~16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便是一个典型。意大利三个重要的商业城市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热那亚,得益于西欧教会组织的十字军东征,大规模地发展了与东方的商业贸易。意大利人“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sup>⑧</sup>正是由于海外商贸,培育了一代意大利文化新人,造就了一批意大利文艺巨子。“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sup>⑨</sup>意大利人的长途旅行为了经商,意大利人的冒险精神亦为了经商。与东方的大规模通商不仅为意大利人带来了巨大的经营利润,同时给意大利人带来了东方的文明和文化。在这个基础上,才形成了意大利一个多世纪的文艺繁荣,造就了一批空前的文化伟人。随着绕过非洲的航路的发现,意大利作为东西方商贸中枢的地位失去了,它的文化事业便也就一蹶不振了。由此可以见出,通商对于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交流和影响确实具有重大的作用。

留学是某文化区域的人向其它地区学习其它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在社会文明发展的历史,世界各地的文化始终处于一个相互大学习、大交流的状态,而留学是实现这种相互大学习、大交流的重要基础。例如在中国的唐朝,由于国家强盛、文化发达,吸引了日本大规模到中国来学习。“据史书记载,日本派来中国的遣唐使不下十三次。每次总有留学生、学问僧多人附使船同来中国。如653年(唐高宗永徽4年),日本派出两批使船,每批各有留学生、学问僧一百二十余人。716年(开元4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五十七人。732年(开元20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五百九十四人。759年(唐肃宗乾元2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九十余人。834年(唐文宗大和8年),日本使船总人数有六百五十余人。至于附商船往来的日本学生和僧徒,为数也不会少。唐时汉文化的各个方面以及佛教的各个宗派,大体上都移植到日本,给日本文人以巨大的影响。”<sup>⑩</sup>又如近代中国,鸦片战争失败后,心系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纷纷留学海外,他们带回的国外科学和民主的新观念有力地冲击了中国数千年的黑暗统治,为创建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随着交通、通讯和信息事业的发达,整个世界宛如“地球村”,留学作为不同地区间文化交流的手段也将发挥出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留学是留学者到海外去接受其它文化,传教则是传教士到海内来散布其它文化。在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方兴未艾的时期,它们都有传教士到世界各地传教宣道。如“印度佛教徒在东汉时陆续来华,灵帝光和二年(179年),印度沙门竺佛朔带《道行经》到洛阳,译经二部。东汉末年,印度维祇难、兰律炎、竺大力、昙果、昙柯迦罗等到洛阳译经”。<sup>⑪</sup>至魏晋南北朝,印度佛教徒到中国来传教就更多了。他们所带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在对人生的看法、处世的态度,以及文艺方面,都留下了其印记。又如中国明代,耶苏教会到中国的传教。其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在中国宣传天主教义,“介绍西方的天文、算学、理化知识,将自鸣钟、地图、天象仪器、威尼斯制造的三棱镜等陈列室内,任人参观”,并最后送给中国政府。<sup>⑫</sup>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布和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启蒙产生很大影响。可以说,传教活动只要不是抱着侵略的野心和吞并的目的,对文化的接受者来说总是利大于弊的。

战争、通商、留学、传教是人们进行区域文化交流曾有过的四种主要途径。通过这四种途径产生的一种文化对其它文化的影响,必然在“原本”和“摹本”之间造成异同,这样就形成了以文化现象和美学现象的比较研究为主旨的学科。这种文化的、美学的比较研究即属于“影响比较”。就本书而言,由于史料和学识所限,我们侧重是以古代的东方美同西方文化之间的事实关系的描述,勾勒了早期的西方文明借用和吸收了哪些来自遥远东方世界的美的因素,又怎样消化这些外来因素,这些东方美学思想,有些甚至只能说是东方美的外表上的、形式上的东西为西方文化所借代、融合、模仿、化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影响过程。这种“影响比较”虽没有过多的理论阐发,但其效果的直观性,事实的客观性,显然要比泛泛的“平行比较”更有价值。

## 五

把世界上的文化截然分为“东方”和“西方”是不准确的,因为即使在“东方”和“西方”的各自区域内,还存在着不同的文化。产生影响的“原本”各不相同,接受影响的“摹本”亦不相同。区别“东方”和“西方”只能是一个大致的划分概念。在本书的论述中,“东方”指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文化,“西方”则指以西欧为中心的文化范围。这两种文化——以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发展起来的东方文化和以爱琴海沿岸古代文明发展起来的西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都起过极其巨大的推动作用。它们不仅如皓月照亮着人类的蒙昧之夜,更如火炬传递人类的文明之光;而东西方这两种文化的相互影响则如浪涛的推澜之势演示着人类文明的进步。

在历史的长河中,西方文化曾对东方产生过重大影响,东方文化也对西方产生过重大影响。由于这种相互影响,才在东方可见到“欧化模式”,在西方可见到“中国风格”。“渺渺海水,取一瓢饮”。我们将在文化和文明的历史变动中选取一点,以探东方的美学思想对西方文明产生的某种影响。

美学思想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指导,社会文明的结晶,社会文化的积淀。美学思想最富于功利性,又最不具功利性;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它是功利的;作为社会文化的积淀,它又是非功利的。美学思想最富于民族性,又最具有世界性;作为社会实践的指导,它必然带有实践的民族的特征;作为社会文化的积淀,它所体现的人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又必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所以,探索美学思想的区域交流,对于研究世界文化的区域交流可真正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作用。而这正是我们期望和努力的。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51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③普列汉诺夫:《论艺术》第12页,三联书店1973年版

④海斯、穆恩、韦兰合著:《世界史》下册,第1059页,三联书店1975年版

⑤刘勰:《文心雕龙·知音》

⑥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⑦⑧《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陆梅林辑注,第368页,第3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⑨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第286~28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⑩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第79页,第367~36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